

知识的批判

程 刚 郭 瞻 予 著

辽 海 出 版 社

自序

大约是在今年的4、5月间，经友人推荐，蒙辽海出版社信任，我接受了该社拟议中的《知识的批判》一书的写作任务。

“知识的批判”这一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既令我敬畏有加，又使我激动不已，在渴望体验“理论快感”和语言表达的强烈冲动驱使下，竟然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冒“批判知识”之险，欣然允诺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篇“命题作文”。

为了完成这项我素有兴趣但却倍感艰难的急务，半年多来，我浅居斗室，浏览了我所能搜集到的绝大多数相关文献，其间除了不得不承担的几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和为应付名节之求而撰写了几篇小文及偶有学术“帮闲”尔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知识的批判”上了。尽

管如此，还是未能践行于今年9月长沙图书展销会之前交稿成书的约定和承诺。对此我不能不心存愧疚。

批判是理性的天然本色和应有之义。批判也是宝贵的思想武器。批判的理论预设就是要否定。因此没有批判也就没有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个缺乏正当合理的批判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不健康的没有发展可能性的社会。诚如著名现代教育家雷沛鸿先生所言：“人类的文明进步有赖批判精神的存在，否则社会生活将濡滞不前，甚至流于僵化没落。……只有容许批判的余地，才有好的社会和好的个人。”（陈友松主编：《雷沛鸿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正当合理的批判是坦诚公正、不存私念的批判，它服从于事实和理性，其目的在于革除弊端、促进发展。批判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也经常被误用，像国人经历得太多了的各种冠以“革命”字样的大批判就是如此。那种批判多次使人类的理性和良知蒙羞受辱，也败坏了批判自身的名声，以致使人厌烦和讳言批判，因而不能从批判中受益。

本书以“知识的批判”为题，立意并不是把知识当作“错误”或“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而是对作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和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重新审视或检讨。“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这种“法典”意义上的批判，在本书中仅适用于那些出于宗教、政治或其他原因而贬损知识、反对科学的“知识偏执狂”和“科学制假者”，以及对真正的科学知识大兴问罪之师的批判者。因此本书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兼有批判之批判的含义。

本书起初的构想力图比较全面完整，诸如知识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等论题都曾罗列其中。这些内容没能在书中得到反映，主要是因为时间所限而不是出于技术性的原因。本书现在提供给读者的内容是非常有限的，没能充分体现先前的基本设想。作者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对选定的几个重点问题的社会起因和意义表达了一些不尽成熟的想法，也言及了一些学术敏感问题，甚至还提到了参与其事或与论题有关的一些具体人物。之所以如此行文或选择这种表达方式，完全是出于说明问题和学术讨论的需要，别无其他用意。应该说，多数问题都还论述得尚不充分。

谨此为序。

目 录

自序·····	1
1. 导言：知识的概观·····	1
1.1 古典主义知识观·····	4
1.2 科学主义知识观·····	13
1.3 实用主义知识观·····	26
1.4 心理主义知识观·····	31
1.5 知识经济知识观·····	39
2. 知识进步的代价：两种文化的分裂·····	45
2.1 C·P·斯诺的演讲·····	47
2.2 问题的源流及其考辨·····	53
2.3 深层原因的分析·····	74
2.4 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理性重建·····	91
3. 知识的际遇与不幸：反科学思潮·····	111

- 3.1 宗教领域的反科学思潮 112
 - 3.2 世俗文化领域的反科学思潮 122
 - 3.3 社会政治领域的反科学思潮 134
- 4. 知识前沿面临的困境：科学终结论 229
 - 4.1 霍根其人其书 231
 - 4.2 科学终结论的原委 233
 - 4.3 科学终结论之误 255
- 5. 理性的迷失：情商制胜之道 279
 - 5.1 从智商到情商 279
 - 5.2 国情不同应有异 294
 - 5.3 理智与情感谁先行 302
- 6. 现实的判断与选择：科学与人文何者更稀缺 313
 - 6.1 相关概念的澄清 313
 - 6.2 科学与人文的对话 316
 - 6.3 科学与人文并非对立 321
 - 6.4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 325
- 后记 331

1

导言：

知识的概观

知识是人类理智活动的产物，因而也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有关知识的追问和论辩早已成为人类思维领域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

对“知识的寻求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人类文明史就是由知识铺垫编织而成。正是由于知识的创生、积累和使用才使人类超越了动物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进化机制，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等不朽之业的过程中，摆脱了个体有机生命的短暂和局限，既使个体生命具有了超越天年的价值，也为后继者提供了新的发展起点。

人类的循环加速发展机制有赖于人类文化的支撑，

只有在前人奠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类才拥有了其他物种难以企及的优越性。不但像牛顿（Isaac Newton）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肯于谦逊地承认自己是由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显得高大深邃，而且所有的普通人也都因为社会所特有的世代相继机制才得以在既存的社会文化起点上以人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社会文化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以及营造社会生活的活动产物，包括物质性的产物和精神观念性的产物两个方面。就其对人类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后者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和未来的时代更是如此。确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著名思想实验所深刻喻示的那样，假如物质形态的技术系统毁灭了，而精神形态的知识系统（如图书馆）和人的学习能力还保留着，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艰苦历程，就仍然可以重建人类文明，继续在较高的水平上前进。如果认为波普尔的这一看法确有道理，那么我们对诸如知识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的至理名言的深刻涵义就会有更为透彻的理解。事实上，在追求社会进步、对社会和人生持积极态度的文化传统和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有关知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早有共识，对此毋须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享用知识的恩惠并以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丰富或充实人类知识宝库的同时，是否思考过知识本身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对人类的影响等方面也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并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是否意识到人类在探索客观规律、追求知识或真理的过程中曾经多次陷入迷茫，甚至跌入误区？是否真正理解认识史和思想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曲折和失误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否怀疑过某些流行于理论界和世俗社会的时髦观点的合理性？是否思索

并追问过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反对科学、弃置知识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深层原因？等等。这是理智世界和知识阶层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

人类远非尽善尽美，人类创造生产的知识也不可能万古长青无一缺失；人类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他容易犯错误，并且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曾屡遭谬误和偏见的袭扰，不但曾经因为无知而踟蹰不前，也曾多次为理智的迷失和由此产生的习惯、定势等心理惰性以及认识上的偏见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为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理智世界对知识的反思和批判贯穿于人类的整个文明史，特别是在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这种反思和批判更是经久不衰、绵延不绝。当前世界已逐步进入“能力本位”“智力中轴”的时代，知识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攀升，“知识经济”、“知本家”、“给大脑定价”等时髦词汇在我国也逐渐成为流行话语。随着知识的有效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在曾经多次流行知识无用论的神州大地又呈现出追求新知、热心向学的喜人景象，但与此同时，旧有和新生的有关知识的单纯实用功利主义理解和某些理想主义的文化梦想也进一步滋生蔓延。尽管这种社会存在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意志而被随意加以改变，不过在理智资源已经不再完全被弃置不用的社会条件下，理论和学术工作者不能借此推卸预瞻未来、审时度势和思想启迪、行为引导之责。基于这种考虑，值此知识文化热潮又兴之际，重新检讨知识问题，冷静地思考一度流行的与知识有关的思想主张和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闹剧，就显得尤为必要。

知识的本性及其进化发展问题是一个超越特定具体学科的疑难问题。古往今来，以知识为主题的论述可谓汗牛

充栋、层出不穷，但迟至今日仍是歧见纷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经常是殊异玄绝、大相径庭。究其原委，可否这样认为：一方面，由于对知识本质的探讨长期受哲学认识论的影响，研究框架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突破，深入的实证水平的研究还略嫌不足；另一方面，相关的具体学科和理论派别都从自己的角度为知识立论，缺乏各个学科之间和各个层次之间的有效综合。本书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尝试性探索。为了对知识本身有更为深入系统的了解，也为了使随后的讨论有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概念基础，让我们首先对有关知识的基本观点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历史上关于知识本性的议论，门派众多，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比较系统的观点主要有古典主义知识观、科学主义知识观、实用主义知识观、心理主义知识观和知识经济知识观五种见解。

1.1 古典主义知识观

古典主义知识观来自于传统哲学。哲学作为人类最先出现的理论地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起源于人类开始以物质原因来解释世界之时。自开天辟地、人类理智萌发之初，理智世界就对自然奥秘感到惊奇并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追问，不但追问自然之谜本身，而且追问对自然的探索过程及其活动产物，于是就产生了知识究竟是什么这一事关知识本性、看似寻常而又十分费解的问题。这个同哲学一样古老的问题，千百年来既令人沉醉痴迷又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让许多智力精英耗尽了毕生精力，而对知识本性

的追索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难以解答的哲学问题。

“古希腊人以‘哲学’这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指称各种理论知识”。（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页）我们现在使用的“哲学”这个术语，其希腊文原意就是智慧和知识，哲学的本义就是智慧之学，哲学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教导人们求得关于世界本源的知识。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有关知识的哲学断语和箴言就不绝于史册。古希腊在人类文明史上之所以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开创了人类弘扬理性和追求知识的文化传统。在古希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主要是以理性沉思的方式围绕着“一”与“多”、“一般”与“个别”、“稳定”与“变易”、“感觉”与“思维”等相互矛盾的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展开的。先哲们都曾研讨或涉及过这些问题，并且做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

古希腊早期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指出：“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页）“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同上书，第22页）在他看来，感觉经验固然可以使人博学，但是不足以使人智慧，“最优秀的人宁愿是一件东西，而不要其它的一切，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同上书第25页）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只要对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规定性作出说明，就算达到了最高的智慧，不过他们不是从感性存在物中寻找本原，而是用抽象的“数”来说明万物的变化，提出了“万物皆数”的命题。在他们看来，数即知识，知识也就是数字。尽管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却足以表明，

希腊人的理论思维又有了新的发展。大约与赫拉克利特同一时代的爱利亚学派在哲学的基本精神方面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强调真正的存在是“一”而不是“多”，“一”是精神实体，只有认识了“一”，才能得到真理。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门尼德（Parmenides）认为，真正的存在是一种只能在思想中加以把握的精神的存在，把握这种存在的认识才是“真理”，其他认识则都是“意见”。巴门尼德可能已经看到了认识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感官的直接对象永远是“多”，但是在思想中的反映却逐步变成了“一”。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对“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一”来自于“多”，主张不要到“多”以外去寻找“一”，并提出“射流说”来说明对象向感觉和思想的转换过程。德谟克利特（Democritos）从他的原子论出发，在“射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像论”，认为不仅作为万物始基的原子和虚空是真实的，而且作为杂多的现象也是真实的，所以他不完全同意前人关于感觉只能提供意见，理性才能获得真理的说法。在他看来，现象就是真理，意见和真理并非完全对立，感觉和理性各有所司，它们对于知识来说都不可缺少，但二者并不是必然可靠的。

智者学派把德谟克利特提出的知识的矛盾性加以充分发展，对认识客体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其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口号，认为外物究竟如何，完全依个人的感觉而定，只有可感觉的东西才是存在的，超出感觉之外的事物都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根本认识不了的。这样，感觉不仅是认识的唯一途径，而且又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这些

看法存在多么明显的局限性，但却表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主观因素的作用。继普罗泰戈拉之后，智者学派的另一重要思想代表人物高尔吉亚（Gorgia）进一步证明，要想寻求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只能是枉费心机，认识的结果和认识的对象在形式上是很不一致的，思想之所以为思想，不在于它的直接性，而在于它的间接性，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个别，而认识的结果则必须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一般，否则就不成其为认识。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打破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的盲目乐观情绪，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另辟求知之路。苏格拉底（Sokrates）就是有感于世界本原、宇宙演变等问题非人力所能及而转向探索人类社会事务，认为学人应该研究自己的社会，以辨明善恶是非、求得社会道德面貌的改善为基本职责。苏格拉底继承了爱利亚学派的传统，贬斥感觉，抬高心灵，视抽象理智为唯一有效的致知途径，强调唯有一般知识才是真知识，只有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才有意义，甚至把全部知识的内容归结为一个命题：“美德即知识”。他还第一次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区别问题，指出认识的方向应该是摒弃个别和特殊，而去追求一般和普遍。这表明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万物之外去寻求一种单独的本原，而要求深入到万物之中去探索它们的本质了。

柏拉图（Plato）继承了其师苏格拉底的哲学事业，但他把一般与个别加以割裂，构筑了一个“相”（Idea，旧译为“理念”，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58页）的天国，使之与具体的感性现象世界相对立，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和“意见”作了严格的区别。他认为，“意见”来自于可见的现象世

界，知识来自于可知的“相”的世界；感觉只能提供暂时的、表面的“意见”，只有通过思想才能认识一般、即“相”，从而获得知识；“意见”只是由无知到知识的一种过渡性心理状态，“意见既非无知，亦非知识”，它“比知识阴暗，比无知明朗”；（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23页）“意见”分为关于实际事物的“意见”和对实际事物的摹仿的“意见”，知识则包括算术、几何、天文等有关自然的知识和真理（或绝对知识）两个层次。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一般、共相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着重分析了人类如何获得关于一般、共相的知识问题，实质上是强调和提高了抽象思维的地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知识问题开辟了道路。

柏拉图的学生、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s），有鉴于柏拉图抬高一般并割裂一般与个别的片面性，在知识的问题上致力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他认为，柏拉图的主要错误在于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否定了一般、共相固然不可能有认识，但一般、共相不是直接的认识对象，因为一般、共相自身不可能独立存在；一般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真实存在的事物必然是个别或特殊，不可能是一般，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神秘的“相”，具体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共相与特殊的统一体；感觉是认识的第一个行程，但感觉是肤浅的，它的内容是由客体决定的，仅涉及到个别事物的知识，关于普遍、一般的理论知识比感觉经验更重要；知识本身不是“或然性”的意见，而是真理，真理是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而证明首先应当是理论与客体的相符合。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古典知识观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Raphael）的名画《雅

典学院》（亦译《雅典学派》）十分传神地描绘了柏拉图用手指着天空、亚里斯多德用手指着大地的情景，这些艺术形象抓住了两位伟大哲学家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的本质区别，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经久不忘。这种区别事实上贯穿于此后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形成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交相辉映的两大主流。两派在历史的延展过程中围绕着“一般”能不能单独存在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一争论到了中世纪便形成了唯名论和唯实论（或实在论）这两种观点和学派的对立。

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客观上存在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而在于表现为一般的思维的确实性何在？因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便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研究的侧重点也由客体本身转移到主体的认知方式及其可靠性方面。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对人的认识方式曾作过极为精彩的比喻，他说：“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0—41页）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则对哲学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就哲学的研究范围加以限制，明确地把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认为哲学的本质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其中心任务是要回答“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笛卡儿的认识论是从怀疑一切开始，通过对思维活动的理论分析，从

而确定“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原理，以及“上帝存在”、“各种事物及事物的性质存在”等最基本的“天赋观念”的合理性。他坚信，“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的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笛卡尔：《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页）感觉是易谬的，常常被现象所迷惑，只有理性思维才能达到科学的要求，理智决不会欺骗我们，“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同上书，第3页）

笛卡尔之后，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问题上各执一端，走向了片面：前者重视思维的内容而忽视了思维的形式，后者只着眼于思维的形式而没有对思维的内容给予应有的注意。事实上，认识的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建立在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就认识的直接对象而言，它永远只可能是经验所提供的个别；就认识的结果而言，它却又永远表现为思维所提供的一般。经验论者坚持认识开始于经验，认为凡是在理性中的必首先在感觉中，但却不懂得理性认识的本质，不懂得科学抽象，把理性简单地理解为感觉经验的机械组合或分解，最终导致了否定人们把握普遍必然性知识的能力，走向了不可知论。唯理论者抬高理性认识，贬低甚至否定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认为感性认识只能提供个别偶然的知识，唯有理性认识才能提供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可靠知识，把知识与感性世界相隔绝，使知识本身成了无根之草、无源之水，导致了独断论。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虽然两派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甚至对立的观点，但起点都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什么，当我们宣称自己拥有某种知识时，如何才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殊途同归，都以颂扬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探索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为始端，以取消人类认识的发展而结束，把疑难留给了后人。康德（Immanuel Kant）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片面性，试图批判地总结两派的经验教训，调和二者的矛盾，以便从他们的迷误中解脱出来。他认为，知识的逻辑形式就是判断，但并不是一切判断都能提供新的知识，也不是所有的判断都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根据唯理论的原则建立的知识，总是表现为先天分析判断，这种判断在抽象思维领域虽然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并不能增加什么新知识，不能扩大知识的范围；根据经验论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知识，总是表现为后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虽然对事实有所断定，但却不能保证判断本身是必然的和普遍有效的。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不断地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为弥补上述两种判断的缺陷和不足，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在他看来，没有这种判断，知识便是不可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中的许多命题实际上都是先天综合判断，例如，“ $7+5=12$ ”，“在物质世界的所有变化中，物质的量保持不变”，就是既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又具有扩展性，能够增加新知识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把科学知识看作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他试图借助先天综合判断来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割裂感性和理性这书共有的缺陷，既肯定经验论的原则，承认认识始于经验，又遵循唯理论的主张，同意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不是来自于各观经验而是由主观上的“自我”提供的观点。这就是说，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引起的感觉经验，另一个是理性先天固